

# “目加田诚的中国文学研究” 课题意义

◎孟彤 孔令蕾

**摘要：**目加田诚是日本近现代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文本研究、翻译译注、文学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许多始开先河，独树一帜的贡献。他是日本最早对《诗经》进行纯文艺学术研究的开创者，是日本将民俗学方法融入《诗经》文本研究的第一人。他所翻译的《诗经》，被日本学术界公认为无有出其右者。他还是首位进行《文心雕龙》现代日语翻译的学者，同时也是二战后日本开展《文心雕龙》研究活动中最为积极的学者之一。

我国学术界针对目加田诚的研究仅止于介绍阶段，至今未有对目加田诚的中国文学研究进行全面细致的专项研究。目加田诚在日本的中国学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对其学术进行梳理和解析，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有价值的。

**关键词：**目加田诚 中国文学研究 《诗经》 《文心雕龙》

目加田诚（1904—1994），是日本近现代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文学博士，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他是日本学士院会员、九州大学名誉教授、早稻田大学教授、九州大学中国文学科与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科的研究生院的开创者。在长达90年的人生岁月里，目加田诚写了大量的文章论著，研究领域几乎涉及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文学，在文本研究、翻译译注、文学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许多始开先河，独树一帜的贡献，并以“中国文学研究功绩”为名获得过“西日本文化奖”。在日本中国学术界，目加田诚享有很高的声望，许多学者都对他学术成就的意义和价值做出了极高的评价。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松浦友久就曾这样说道：“在思考近代日本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时，目加田诚博士无疑是其中最优秀的开拓者和形成者之一。”

在日本《诗经》学史上，目加田诚的研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针对他的《诗经》研究，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村繁评价说：“它展示了与陈腐学说完全不同的崭新的诗经观”。摄南大学教授高桥繁树说：“《诗经》划时代的新解释就此问世……自这个研究发表以来，日本的《诗经》研究面貌完全改变了……他直视文学的根本的态度，使《诗经》的本来面貌得以重现，并颠覆了近两年持续的儒家思想的传统道德。”这些评论均向我们明示一点，在日本《诗经》学史上，目加田诚的研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目加田诚是日本最早将《诗经》从经学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对其做出纯文艺学术研究的开创者，其崭新的《诗经》观启发了后来很多的学者，同时，

他还是日本将民俗学方法融入《诗经》文本研究的第一人。他所翻译的《诗经》，无论在语言优美程度上还是在思想理解深度上都达到了前人未及的境地，被日本学术界公认为无有出其右者。不仅在《诗经》研究领域有着瞩目的成就，目加田诚还是首位进行《文心雕龙》现代日语翻译的学者，同时也是二战后日本开展《文心雕龙》研究活动中最为积极的学者之一。正因为他在日本现代《文心雕龙》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地位，才会被日本方面一致推举为代表团团长，参加了1984年复旦大学召开的第一届“中日学者《文心雕龙》研讨会”。

目加田诚的中国文学研究视角极具广泛性、平衡性。研究内容既包括文学批评，也包括文学理论研究；研究成果既有面向大众的译著和诗集，又有专业性的论文和专著。他既研究诗文，也研究小说戏曲，既重视《文心雕龙》《诗品》这样在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作品，又对当时不为人重视的唐代诗格予以关注。他的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开放性的特点。比如其文本内部研究方法，就以灵活的翻译手法、不拘泥于古注见长。在文本外部的研究方法上，他重视运用各种知识来了解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其广泛的文化学、比较文学的研究姿态。目加田诚没有陷入到“学究”般的象牙塔中，而是站在高屋建瓴的角度来审视各种文学资料。其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结论所具有的平衡性，让人在心生赞叹的同时，也深感一名学者兼顾学术专业性与众普及性的苦心积虑。

若将目加田诚的学问置于近代日本中国学史上，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学问是那

样的与众不同。严绍盪先生在《日本中国学史稿》（2009）一书中将日本近代中国学古典研究的主要学术流派分为了三类。一是活跃于京都帝国大学，以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与支那学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学派”，二是以白鸟库吉等人为代表的，在批判中国文化的同时，追求日本自身近代主义建立的“批判主义学派”。三是以服部宇之吉为代表的，将学术研究服务于天皇体制的“新儒学学派”。目加田诚的中国学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不同于上述几个流派，乃至现代的一些中国学者治学的风格。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 一、不以儒者教养的达成为目的

在20世纪初的日本中国学者中，有许多人在接受了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洗礼后，还往往不自觉地留有旧儒思想。如目加田诚在东京帝国大学时期的业师服部宇之吉，便以“孔子教”为其全部学问的最终归旨。服部宇之吉认为戏曲小说不是文学，目加田诚则认为所有用文字写成的文艺作品都属于文学。在文学思想上，他与业师对文学的根本看法是背道而驰的。他的另一位老师盐谷温，虽然首开大规模在大学中讲解小说戏曲的研究之风，被誉为日本中国学“俗文学”领域的开拓性人物，但其行为举止仍脱离不了旧儒之风，目加田诚对这点是非常反感的。目加田诚虽然有着古典文学的教养，却十分反对以这种教养的达成作为学问的最终目标，他的学术更多地展示了一名近代学术研究者的客观立场。

## 二、不拘泥于文章训诂的研究

实证主义扎实的文字功底是古典文学的文本内部研究对研究者提出的要求，日本的古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往往长于文献的整理、文本的批评，着重对文本内容本身做研究。但目加田诚认为，所有的基础作业必须在文学研究之前完成，类似训诂考证般的研究不能成为文学研究最终之目的。他反对只在文章小学中发力，认为文学研究不应停留于字词的表面，最重要的是要深入研究对象的本质，对其做出美学价值的判断。目加田诚的研究成果中有不少是古籍的翻译和注释，但他刻意避免作一般性的、罗列前人之说的注释。在他看来，对古典文献作注释是研究基础作业，是为了能更好地参透文本蕴含的作者思想之手段，而非研究之最终目的。比如在对《诗经》作注时，他只选择了古今学界难解之处，或针对古注有所怀疑之处进行注释。他忌讳在文章中用事用典，却十分重视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这些都说明在学问之道上，他的研究方法在日本中国学界重要柱石之京都学派重视考证的学风有着不同的侧重。

## 三、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体味人生，找出人类生存的意义

目加田诚自身有鲜明特色的，不同于一般的日本中国学学者的研究特点。目加田诚热爱中国文化，努力发掘中国文学中表现出来的积极的闪光的人性一面予以肯定，这点与一些近代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贬损的扭曲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一些现代学者，如竹内好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派有所不同。竹内好等人主张建立研究主体的极度客观性，对研究对象进行部分喜好的研究。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是为了自身文学观与日本文学近代化的建立。目加田诚的研究与那些将中国文学放置在手术台上进行冰冷分析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同时也跳出了狭隘地从兴趣主义出发进行研究的路数。与一些学者为了兴趣而研究，或为了研究而研究不同，目加田诚的文学研究展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情结，以真诚的文艺之心对待研究对象，即便是面对唐代诗格这样论述作诗的规

则，以蒙学或科举应试为目的的功利性很强的研究对象时，也不失其纯文艺的研究视角。他常常对文学作品背后作者的精神、经历、时代背景进行考察，还从写作者的共感角度出发分析作品。这是因为他希望通过研究历朝历代的文学，探究中国文学的本质，寻找作品中蕴含的人类情感中那亘古不变的真善美。

目加田诚一生先后六次来过中国，曾于北京留学三年，与胡适、俞平伯、周作人、郁达夫、鲁迅均有过面谈。1955年，他在大野町发起“日中友好运动”，并设立了中日友好协会，该协会曾于1963年接待过由游国恩、侯外庐等学者组成的学者团。

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位在日本近代中国学史上具有突出贡献、有着鲜明学术特色、与解放前中国学术界多有接触、对中国学术常保持高度关注的日本学者，我们了解得并不多。他的研究成果，被翻译成汉语的只有区区三篇文章。分别是：《词源流考》，中国抗战时著名的《国文月刊》杂志曾刊登过汉译文；《刘勰的风骨论》，收入1983年王元化选编《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中国文艺中“自然”的意义》，收入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从国际汉学角度来讲，外国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往往能从异于我们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出发，得出有价值的结论。目加田诚在国际汉学重镇之日本的中国学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对其学术进行梳理和解析，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有价值的。

### 参考文献：

- [1] 秋吉久纪夫. 目加田诚先生悼词 [J]. 中国文学论集目加田诚先生追悼号, 1994, (23): 11-13.
- [2] 松浦友久. 才、学、识 [A]. 目加田诚著作集第七卷·月报 [C]. 东京: 龙溪书舍, 1981.5-6.
- [3] 冈村繁. 回忆目加田诚先生 [J]. 中国文学论集目加田诚先生追悼号, 1994 (23): 6-10.
- [4] 高桥繁树. 目加田诚先生晚年的研究与文学 [J]. 中国文学论集目加田诚先生追悼号, 1994 (23): 14-18.

[5] 严绍璜. 日本中国学史稿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

[6] 目加田诚. 目加田诚著作集第四卷 [M]. 东京: 龙溪书舍, 1985.